

清詩選

丁 力 选 注
乔 斯 补 注



0271/04

清詩選

丁力選注
乔斯補注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30023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030023



清 诗 选

丁 力 选注

乔 斯 补注

责任编辑：陈仿麟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，499,000 印张，24.875 印数，1——16,830

统一书号：10169·1908 定价：(平装)3.85元(简易精装)4.15元

DE71/04

前 言

“五四”以来许多文学史家、诗歌史家，有一种极不公平的看法，认为我国诗歌发展到了清代，已经衰落，没有什么好诗了。甚至还有一种论点：认为诗盛于唐，到了宋，就不得不让位给一种新的诗体——词；到了元、明，词的形式又已僵化，不得不让位给另一种新的诗体——散曲；到了清，散曲又已僵化，不得不让位给另一种新的诗体——杂曲、小曲。于是他们写诗史时，诗盛于唐就完了，到宋代只谈词，到元、明，又只谈散曲，到清代，又只谈杂曲、小曲。这种看法，影响过许多人，我过去也曾经相信过，并跟着说过。

这是一种进化论的观点，只从形式的发展上来看问题，表面上看起来很“新”，实际上是很不科学的。

我国诗歌的历史长河，好象长江一样，起初源头很小，愈到后来，愈流愈大，汇合的支流愈来愈多，虽然有时碰到三峡那样的峡口，歇落一个时期，但通过峡口，就流得更猛。这个比喻，自然还不够确切，不过可以说明我国诗歌历史长河，不仅没有中断、没有枯竭过，而且愈流愈大，一泻千里。

每一个历史阶段，由于时代、生活的变化，总有新的诗体产生，这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规律。

每一种新的诗体产生，并不等于旧的诗体马上死亡，不再发展了。不能这样简单的看问题，也不符合诗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。

例如宋词很发达，但古风、乐府体、近体诗依然存在、发展，而且写的人之多有盛于词。元、明散曲很发达，但诗、词依然有人在写，依然在发展。清代亦然。

决定一首诗的好坏，不能光从形式的新旧来看，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内容，取决于诗风，取决于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

每一次新的诗体产生以后，旧的诗体还要活相当长的时期，一方面由于新的诗体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多方面的要求，另一方面由于旧的诗体有的也在不断改变诗风，求得发展。

同时，还由于词和散曲，有一种传统的局限性，它的题材大都是写爱情、风景和离情别绪，反映国家大事、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不多（象辛弃疾、陆游、岳飞、文天祥那样写词的人是很少的）。从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上比较，说句公道话，在历史上，词和散曲是不如诗的。诗，特别是乐府体，有个优良的传统，就是尖锐地反映社会问题，反映人民生活 and 时代精神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了词、曲以后，诗还要继续存在、发展下去的另一个原因。

这只是比较而言。任何一种诗体，都有写得好的，写得坏的，不可一概而论。我只是想说明，那种认为有了词就否

定诗，有了曲就否定词的观点，是错误的。

至于历代有些正统文人，认为“词乃诗之余”，“曲乃词之余”，不承认词、曲是诗的一种，因此，不能列入诗的正统，当作歪门邪道，加以轻视。当然，这种观点更是错误的。

说清楚了上面的问题，我们再来看清代是不是有好诗，是不是有大诗人，那就容易理解了。

清代的杂曲、小曲作家不多，这种诗体并未普遍盛行；散曲作家也很少；词虽说超过了元、明，却远不及宋；能够代表清代诗歌总的面貌的，还是古风、乐府体和律诗绝句体。

清代民歌数量之多而又保存下来的，是任何历史朝代所不及的。清诗也是如此。

“诗盛于唐”这句话，就唐以前而论，是正确的；就唐以后而论，就不一定正确了。

我们知道，《全唐诗》共录了诗人二千二百余家，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。《宋诗纪事》搜罗宋诗人至三千八百余家，《宋诗纪事补遗》又补录三千余家（其中有一部分重复），名家诗人还未计算在内，单陆游、杨万里的诗各在万首以上，无论在人数和首数上，都大大超过了唐代。据《御定四朝诗》，录了金代诗人三百二十一家，元代诗人一千一百九十七家，明代诗人三千四百家。《明诗纪事》共录了诗人“几四千家”，这是很不完全的统计，词家和散曲家尚未计算在内。从时代的长短来看，明诗不仅超过了唐，而且超过了宋了。那么清诗有多少呢？单就北京图书馆所藏清诗总集就有二百多种，清诗总集专类就有一百多种，至于诗人别集，简直多得无法统

计，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种。据近代徐世昌辑的《晚晴簃诗汇》共收清诗六千一百余家，诗二万七千余首，这只是一
种选本，很不完全。可以肯定地说，清诗之多，是任何朝代
所不及的。与此相关联的，清代诗论诗话之多，也是任何朝
代所不及的。

清诗之所以多，不完全由于诗歌特别发达，还由于：
一、时代近，散失得少。二、国家幅员大。三、人口增多。
四、文化比过去发达，写诗的人自然会多些。

光多，不能用来衡量诗歌的水平。我们要看它反映现实
的深度和广度如何，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什么程度。

在浩如烟海的诗篇中，清诗也和唐诗一样，大多是一般化
的，好的有创造性的只是少数。但把它们汇集起来数量也仍
然是相当可观的，比这个选本不知要丰富多少倍。

如果说唐诗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，是一座高峰；
那么，清诗在我国诗歌史上，应该称得上是复盛时代，是另
一座高峰。每一个朝代又都有它自己的高峰，总要出现几位
杰出的大诗人。例如唐代最杰出的是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，
清代又何尝没有自己最杰出的大诗人呢！赵翼在《论诗绝句》
中说：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信哉斯言！

既然清代有很多好诗，又有一批杰出的诗人，为什么现
代某些人的印象，却认为清代是诗歌的衰歇时代呢？我想，
大概是由于下列几种原因造成的：一、清代的文字狱很厉
害，株连很广，当时有影响的好诗或者杰出的诗人，不是坐
文字狱，就是诗集遭到禁毁，因此被埋没，诗话家也不敢提
到他们的作品。二、有一批非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正统

诗人，如钱谦益、王士禛、沈德潜、袁枚、曾国藩、王闿运、樊增祥、易顺鼎、陈三立、陈衍之流，号称“大家”，曾经分别统治过诗坛，他们的名字为一般人所熟知，后世学者遂以为他们代表清诗，从这些徒有虚名的“大家”的诗作来看，当然没有什么太好的诗。而这些“大家”大都写过诗话或者编选过诗选，不仅自我吹嘘，而且互相标榜，互相攻击，以扩大他们的影响。三、“五四”以后出版的几种清诗选本，又多半是从这些“大家”中去选，真正的好诗并没有选出来，因此，给读者的印象不佳。四、浩如烟海的清人诗集中究竟还有多少好诗，多少诗人被埋没，谁也不得而知。这就需要我们今天去发掘，去研究，去评价，让当时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，后来被埋没了的诗人得以翻身，以恢复清诗本来的面貌和名誉。

二

清代，是我国长期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。明末由于统治阶级极端腐败，民不聊生，于是掀起了以李自成、张献忠为首的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，各地纷纷响应。一六四四年，李自成部进攻北京，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。终因汉奸大官僚地主如洪承畴、吴三桂等人将清军引入山海关，打败了李自成，统治了全中国。清朝统治者对汉族人民和各地的少数民族实行残酷的民族牢狱政策。于是民族矛盾提到了首要的地位。各地人民与南明诸将领及爱国知识分子，普遍展开了反清斗争、拒满运动。清朝统治者一方面进行残酷的镇

压，大量屠杀，以维持它残暴的血腥的专制统治；另一方面实行收买政策，对封建统治阶级分子加官进级，使他们为虎作伥，帮助清廷统治全国。在文化思想方面，也是一方面大兴文字之狱，迫害汉族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反抗；另一方面宣传宋元理学中的忠君思想和汉奸思想；又开“博学鸿词科”和搜罗山林隐逸，来收买士大夫阶层。尽管如此，各地人民的抗清运动还是此起彼伏，一直进行了许多年；许多遗民拒绝荐举，坚持民族气节，依然暗中进行反清的复明宣传。当然，愈到后来，愈是曲折的隐晦的来表达他们的民族思想感情。

这便是初清总的政治情况。因此，表现在诗歌上，大致也可以分为两类诗人。

第一类诗人是在清朝统治下生活过的明末遗民，可以举出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、陈忱、归庄、阎尔梅、钱澄之、申涵光、屈大均、陈恭尹、梁佩兰、吴嘉纪、沙张白、释函可等人为代表。他们大都参加过反清活动或者不满清廷的残暴统治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。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都是清初大思想家，主要的成就不在诗歌上，但他们的诗都洋溢着爱国热情，感情沉痛，气势豪壮，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，从诗中可以形象地看见他们斗争的一生、伟大人格和思想学问。特别是顾炎武的诗，浑厚沉雄，刚健简练。

归庄、阎尔梅、钱澄之、陈忱，都是以诗著名，诗中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。归庄的《悲昆山》是一首反映抵抗清军的战斗史诗，《断发》表现了清统治者《薙发令》下的民族

感情。阎尔梅的诗雄健苍凉,《悲彭城》也记下了一段抗清史实。钱澄之的诗平易近人,在平淡中满蕴着民族感情和关怀着人民疾苦的生活。陈忱诗风刚健,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。他曾与顾炎武、归庄等人组织过惊隐诗社。

申涵光的诗反映明末清初的离乱的农村破产的情况,现实性很强。邵长蘅长于歌行乐府,反映了战乱时人民的生活。吴兆骞被流放到宁古塔,居塞外二十余年,诗悲壮沉郁,颇有才思,与彭师度、陈维崧有“江东三凤凰”之目。

万斯同博通史学,尤熟悉明代掌故。他的《新乐府词》,就是歌咏明代史事以讽世的。其中《戮奸相》、《五人墓》、《纳闯王》等篇,对农民革命运动的看法比较正确。这种进步的历史观,在士大夫出身的诗人中是非常难得的。

屈大均、陈恭尹、梁佩兰称为岭南三大家。他们的诗现实性都很强。屈诗的影响更大,那些抚事感时、凭吊沧海的作品,更是慷慨淋漓,凄楚动人。如《旧京感怀》,抒发了对故国的怀念和亡国的哀痛。

这类诗人中,我认为吴嘉纪、沙张白、释函可可是清初三位大诗人。吴嘉纪的《陋轩诗》,风格劲健,语言朴素,反映盐民、农民、灾民等的疾苦和揭露清军暴行之作,尤具特色。沙张白的《定峰乐府》,内容丰富,题材多样,现实性很强,尤其擅长新乐府体,多方面揭露了康熙盛世的社会问题和深刻地反映了民生的疾苦,在当时影响很大,堪称诗史。释函可,他是第一个坐清廷文字狱的诗人,后流放千山十年死去。他的《千山诗集》,情感真挚、自然,多亡国之音,与同时遭成诸人相往来,民族思想很强烈。这三位大诗人都是

生在明末，而到清初才大显其创作才华的。在众星灿烂的清初诗坛上，他们是三颗巨星。他们的诗在当时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。吴嘉纪、释函可的诗集，还被清廷禁毁过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这三大诗人都是在野派，互不相识，各自生活在劳动人民当中，故能表达人民的愿望和要求。他们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卓越的，是清初诗人中的杰出代表。可是，在过去文学史上却没有他们的名字。这是极不公平的。

第二类诗人，是明末遗臣或在明末生活过，后降清或参加科举，或被请出山，拖下了水的一批官僚诗人。可以举出钱谦益、吴伟业、龚鼎孳、施润章、宋琬、毛奇龄、朱彝尊、陈维崧、姜宸英、彭孙遹、王士禛等为代表。这批人一向被认为是“大家”，在当时诗坛有过很大的影响。现在研究起来比较复杂，不能一概肯定，也不能一概否定，要看各人创作的具体情况，分别对待。譬如说，降清者与被迫出山者表现在诗歌上就不一样；做官是满意的还是失意的表现在诗歌上也不相同。

钱谦益、吴伟业、龚鼎孳被称为“江左三大家”。

钱谦益的诗以尊宋为主，在明末已属大家，为人品格低下，降清后更致力于诗，封建正统文人把他捧得很高，俨然一代宗匠。实际上，他的诗是反现实主义的，或者说是非现实主义的，艺术性也差，没有什么好诗。

吴伟业就不同了，他的诗才华艳发，辞藻绮丽，反映了明清之际国破家亡、动荡离乱的社会面貌。如《永和宫词》、《圆圆曲》、《捉船行》、《马草行》、《芦洲行》、《松山哀》、《葺城行》等，指出朱明灭亡的因素，写出人民的生活和战

争的摧残。激楚苍凉，风骨遒劲。在《避乱》中反映了清军进攻江南后人们避乱的惨状。他喊出：“天堑非不雄，哀哉日荒燕。嗟尔谋国徒，坐失江山半。”《圆圆曲》中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，对吴三桂是个莫大的讽刺，吴三桂曾“赉重币求去此诗”，吴伟业不许。被称为是“诗史中之董狐”。入清后，他打算保持名节，到了顺治九年，“世网将人驱……涕泣登征车……一官受逼迫，万事堪歔歔。”（《磬清湖》）当了贰臣，伤了名节，感到很痛苦，诗中常有后悔的心情和对故国的思念，哀怨凄惻，不能自己。如“忍死偷生廿载余，而今罪孽怎消除？受恩欠债应填补，纵比鸿毛也不如！”“胸中恶气久漫漫，触事难平任结蟠。块垒怎消医怎识？惟将痛苦付洄澜！”（《临终诗》）他的诗很有工力，风格典雅，尤擅长七言歌行。《四库全书提要》说他格律本乎四杰，而情韵为深，叙述类乎香山，而风华为胜。”我看他的律诗绝句也很好，如《遇旧友》、《哭亡女》、《自叹》、《追悼》、《言怀》、《古意》、《虞兮》等堪称佳作，写得自然流利，明白如话。不过也有不少的诗用典太多，是其缺点。现在看来，他被迫当了清朝的国子监祭酒，当然不好，但与钱谦益、龚鼎孳的情况大不相同。钱、龚是降清的，诗也无什可取。这“江左三大家”，我看只有吴伟业仍不失为大家。

施闰章和宋琬，号称“南施北宋”。宋诗多写个人失意与愁苦，词意凄清；施诗风格朴素，间有反映社会现实之作，如《牧童谣》、《牵船夫行》、《鸡鸣曲》、《采麦词》等篇。

稍后一点，出现了王士禛提倡神韵说，认为神情韵味是

诗的最高境界，极力推崇盛唐，不学李白、杜甫和白居易，遵奉王维、孟浩然、钱起。他选《唐贤三昧集》，李、杜的诗一首也不选，而以王维压卷。他接受了严羽《沧浪诗话》以禅喻诗的理论，欣赏司空图《诗品》中所标举的“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”的意境，因此，他就给诗涂上一层神秘玄妙的色彩，令人难以捉摸。这种主张不适合长篇，最能代表神韵特色的，是他的七言绝句，颇多蕴藉清新、隽永有味之作。但他的诗大都只局限在为清廷服务的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情调，和社会现实距离较远。他居于诗坛领袖的地位，门下弟子很多，影响一大批诗人，神韵说，根本不能解决诗歌要面向现实的问题。实际上是引导人们逃避现实，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诗歌流派。

朱彝尊，与王士禛齐名，诗不如王。至于毛奇龄、陈维崧、姜宸英、彭孙遹、田雯、顾嗣立，以及稍后一点的吴雯、汤右曾、查慎行等都是“卓然大家”，很有诗名，大体不是尊唐，就是崇宋，或者兼取唐、宋。当然，不能笼统否定学习古典诗歌传统的不对，但大都不善于继承并发展传统，只是形式主义的学习，表现在创作上现实性不强，有的甚至逃避现实，学步古人，走上了复古主义的道路。多数是空洞无物的内容，士大夫们的无病呻吟。但也有一部分好诗，揭露了康熙盛世的社会黑暗，如王士禛的《蚕租行》，朱彝尊的《马草行》，田雯的《采砂谣》，无名氏的《淘金谣》，顾嗣立的《关中民》，查慎行的《鸦拾粒行》、《赈饥谣》、《麻阳运船行》等，不能说没有反映社会现实，不能说不是同情劳动人民的声音。现在有的文学史对这个时期的诗人全盘否定，是不妥

的。把他们都归之为抄袭、摹拟派，并不完全合乎事实。例如查慎行是倾心宋调的，特别是学苏轼。但也不能说他们都是抄袭、摹拟，苏轼就没有过上面所举的查慎行那样反映人民生活的诗。我们反对抄袭与摹拟，但不能把什么都归之为抄袭、摹拟，上列诸人多数诗与现实生活有距离，但与明代前后七子中的某些抄袭摹拟现象是不同的。他们主要的倾向是形式主义，是受了钱谦益、王士禛理论的影响，而又各不一样，而有些人由于生活经历不同，或多或少的对现实生活有所反映。在一些无害的作品中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，也还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。

这是与明代前后七子完全是复古主义所不同的。

产生形式主义的另一重要原因，是由于文字狱的惨烈。就是我们所批判的钱谦益那种人，他的著作后来也被禁毁。徐骏诗有“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”，认为是讽刺满清人不识字，被砍头。诵徐诗者也砍头。象沈德潜那样歌功颂德的御用诗人，后来也因为“夺朱非正色，牡丹也称王”的诗句，身后被剖棺剜尸。象这类的事情很多，几乎连年都有，动辄杀头、灭族，株连很广。因此，使得那批被笼络的士大夫诗人，为了保持名禄，当然不敢面对现实，只好钻进形式主义的圈子而逃避矛盾，特别是不敢接触民族矛盾，即有，也是通过吊古、咏物，转弯抹角来表现。如宋琬的《舟中见猎犬有感》一类的诗，就是“表现在民族不平等的地位下作官不是味，以及与满员间的矛盾。”

此外，戏剧家李渔、洪升、孔尚任，小说家蒲松龄，也都善诗，留下不少佳作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：还有一批诗人，在当时不算大家，现在看起来，却比那些“大家”的诗要好得多。他们由于接近人民生活，反映现实比较深刻，是那些“大家”所不能反映也不敢反映的问题。如陶澍的《苦雨词》、《饥民谣》，方授的《赈饥谣》，郭凤喈的《买谷行》，查继诗的《马草行》、《后马草行》，郑日奎的《信民谣》，孙蕙的《安宜行》，徐倬的《骡马谣》，林云铭的《老女行》，钮琇的《采煤曲》，章永祚的《石油湾》，严我斯的《缫丝曲》，朱昆田的《采桑女》，朱樟的《催租行》，费锡璜的《卖儿行》，金埴的《哀东狱》，姚文焱的《御马来》，赵执信的《氓入城行》，赵俞的《踏车曲》，方中发的《田家苦》，何其伟的《米贱谣》，高景芳的《输租行》，钱孙钟的《击柝行》，滑汝谋的《女耕田行》，方正玘的《边农叹》，李勒的《筑堤谣》，黄裳的《赈饥》，沈瀚的《偿租限》，郑世元的《母抱儿》、《捉船行》、《官赈谣》、《牵夫哀》，方泽的《买米谣》，马生佩的《贫家妇》等，都很尖锐地反映了清代“盛世”的阶级矛盾，反映了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后的社会情况。类似这些诗人的诗，还需要我们去发掘，去研究，去肯定。他们的作品，不仅有文学价值，对研究历史的人也是很重要的资料。

三

清诗有哪些特点呢？就我这个选本来说，至少可以窥见以下六项：

第一个特点：新乐府体诗特别盛行。明末清初，反掉了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倾向，乐府诗才重新走上正道，出现了钱澄之、吴伟业、申涵光等的现实性较强的乐府诗，揭开了清代新乐府运动的序幕。

接着，邢昉、吴嘉纪两位遗民诗人，都以乐府歌行著称，他们有强烈的民族思想，歌颂了爱国志士，揭露了清军的残酷，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灾难。他们二人比沙张白略早，奠定了清代新乐府运动的基础。

到了沙张白，由于他发展了白居易的诗歌理论，强调社会意义和时代精神，认为“诗乃有韵之春秋”，“匹夫匹妇之心声”，要“奖正、刺邪、讽谏、箴规”。主张诗要创造，要写生活感受。他高举新乐府运动的旗帜，所撰《定峰乐府》影响极大，使清代新乐府运动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。

与沙张白同时的著名诗人如邵长蘅、郁植、汪琬、陈恭尹、梁佩兰、朱彝尊等，都写过不少现实性强的新乐府。还有万斯同、尤侗等专门歌咏明代史事的乐府，其中也有不少好的。

在沙张白以后的有查慎行、顾嗣立、郑世元、郑夔、蒋士铨等也都以乐府著称。

鸦片战争时期的诗人，如黄燮清、赵函、曹楫坚、朱琦、孙鼎臣、汤国泰、贝青乔等，都写过不少反帝、记战和同情人民疾苦的新乐府体诗。

到了晚清，又出现一批复古主义诗人，如王闿运、易顺鼎、樊增祥等，是乐府诗的一股逆流。

但黄遵宪的大量描写时代精神的爱国新乐府，林纾的表

现改良主义要求的《闽中新乐府》，无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有有一些新的变化，可算清代新乐府运动的殿军。

新乐府多数是属于叙事诗的性质。擅于注意社会问题，反映现实，批判现实，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有抗清的，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，有写农民暴动的，有写工人斗争的，有反对苛捐杂税的，有诅咒逼租抓差的，有批判迷信陋俗的，有同情妇女深受压迫的，有揭露当时社会种种黑暗的，有封建制度不合理的，有要求改革社会制度的。我们要找清代的好诗，应该多从这方面去找。

第二个特点：时代的风雨表。清诗和历代的传统诗歌比较，有很大的发展。有不少优秀诗人把现实主义深化了，它不仅是时代的镜子，更是时代的风雨表。

初清国内民族矛盾突出，在诗歌上有很强烈的反映。民族矛盾，实际上是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。前面谈到初清富有民族思想的第一类爱国主义诗人的反清作品，其深刻性、尖锐性的程度，是超过元朝初期和历史上任何时代的诗歌的。初清以后，这种民族思想的表露，虽较曲折隐晦，但仍然避开了文字狱的罗网，而有所表现。

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、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犯中国，由于清代统治者的腐败无能，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束手无策，只知丧权辱国，割地求和。晚清许多爱国主义诗人，反映在诗歌上的反帝旗帜是十分鲜明的。言鸦片烟之害的如周乐的《鸦片烟歌》、林寿春的《罌粟花》、何春元的《洋烟》等。反映鸦片战争的诗极多，张维屏的《三元里》，顾翰的《俞家庄歌》，是写我国农民和渔民自